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

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

Zhejiang Zuiyou Zhidu Bianqian Jincheng Fenxi

● 卓勇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137.6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

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

Zhejiang Zuiyou Zhidu Bianqian Jincheng Fenxi



● 卓勇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卓勇良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04 - 7352 - 7

I. 浙… II. 卓… III. 地区经济 -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浙江省 IV. 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494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责任校对 寒 聪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 最优制度变迁进程	(1)
第一节 民间创业推动为主的古典式制度变迁	(2)
第二节 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	(7)
第三节 多因素支持	(11)
第一章 挑战沼泽	(15)
第一节 经济活力之谜	(16)
第二节 人力资本大省	(17)
第三节 人与气候和土地的积极关系	(18)
第四节 传统农业对于人力资本的锤炼强化	(22)
第五节 从“率先贫穷”到率先改革	(30)
第二章 历史决定性因素	(35)
第一节 番薯导致的快速贫困化	(35)
第二节 两次战争造就的区域差异	(43)
第三节 “异地上市”	(57)
第三章 三区块解构浙江的空间优势	(66)
第一节 多重互为促进的三区块结构	(66)
第二节 空间均质化	(74)
第三节 多核与双重物流体系	(85)
第四节 增强功能,促进又好又快发展	(99)
第四章 民间的边际革命	(102)
第一节 被边缘化的浙江经济	(102)
第二节 双重拾遗补缺式发展	(104)

第三节 民间边际革命的主要特点	(108)
第四节 过程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	(113)
第五章 从习俗支持到制度支持	(118)
第一节 根深蒂固的自耕农习俗	(119)
第二节 习俗对于民间经济发展初期的支持作用	(121)
第三节 习俗支持的困境	(124)
第四节 积极推进习俗转型	(125)
第六章 所有制结构渐行渐远	(128)
第一节 有利因素胜于不利因素	(128)
第二节 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变迁	(130)
第三节 最优的快速渐进过程	(137)
第四节 加快了浙江经济体制整体转换	(142)
第七章 政府职能及其行为变迁	(144)
第一节 从顺势而为到科学有为	(144)
第二节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154)
第三节 着力创新和强化公共服务	(160)
第八章 省管县还是市管县	(175)
第一节 市领导县是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	(175)
第二节 浙江长期坚持省对县的财政体制	(182)
第三节 发达国家政府层级体制借鉴	(186)
第四节 进一步优化省、市、县关系	(192)
第九章 市场化进程比较分析	(194)
第一节 关于市场化进程研究的简略回顾	(194)
第二节 市场化进程评价结果	(195)
第三节 各地市场化进程的模式特征	(197)
第四节 市场化具有较强的区域发展促进作用	(204)
第五节 浙江市场化进展分析	(206)
第十章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问题	(220)
第一节 增长速度位次持续下滑	(220)
第二节 较难适应全国增长格局	(223)

第三节	浙江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229)
第十一章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	(235)
第一节	市场化水平仍较低	(235)
第二节	当前浙江制度变迁的主要问题	(242)
第三节	加快建设现代市场经济	(246)
附:浙江工业五十年实录(1949—1998)		(255)
第一节	工业经济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255)
第二节	工业经济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265)
第三节	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3)

序言 最优制度变迁进程

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形成了以民间创业创新为主线的最优制度变迁进程。民间企业迅猛崛起,政府较快转变,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浙江特有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这篇绪言试图用“一条主线、两个主体、多个因素”为分析架构,多视角透视浙江这波澜壮阔的 30 年。

30 年间,浙江经济体制由半自然半计划经济^①,快速而渐进平稳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具有高度活力,商品交换体系比较发达,政府公共服务较快增强,创业创新观念深入人心。

30 年间,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1978 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仅 123 亿元,列全国第 12 位;人均 GDP 仅 331 元,列全国第 16 位。2007 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 18638 亿元,人均 GDP 为 37128 元,均列全国第四位。按 2007 年平均汇率计算,浙江 2007 年人均 GDP 为 4883 美元,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②。

30 年间,浙江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各省份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测评,近几年浙江社会发展水平,列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稳居全国第四,社会发展多项指标均大幅上升。

所谓浙江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具有多个含义。从理性角度而言,既是指历史选择的最优,也是指迄今为止浙江经济社会变革过程的最优,具有“帕累托接近”、民间和政府之间的“纳什均衡”、经济社会绩效较

① 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根据世界银行《2006 世界发展指标》,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NI 平均为 4116 美元。

好等多个效应。从感性角度而言,更是笔者对于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一种内心深切感受的由衷表达。

第一节 民间创业推动为主的古典式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的本质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了自主创业的权利。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们在绍兴县调查乡镇企业时目睹,村边田畈上安装着刚刚买来的纺织机械,建筑工人正在砌砖盖厂房,然而机器已经转动,产品已经销售,不再具有种种羁绊的浙江农民,表现出了他们急迫和无穷的创造力。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下,浙江的市场经济体制被快速地、“内生”地确立起来^①。

一 以民间创业为主而展开的古典式过程

中国各地的市场化改革具有较大差异。如果以企业产权结构变迁形式进行划分,上海是以国有企业外资“嫁接”为主的一种市场化改革;江苏先是农村集体企业发展,然后进行改制并大量引进外资为主的一种市场化改革;广东是以创办“三资”和港澳台资企业为主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三个省份,外部体制机制“植入”是市场化进展较快的主要因素。

浙江显然是一种“内生式”市场化进程,民间创业创新是其主要推动力量。浙江多数企业的形成壮大,在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温州、台州一带,直接以个体私营经济形式起步,即由居民个人创办发展而成。在另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杭嘉湖和宁绍地区,先是乡镇集体企业较快发展,然后由于内在的体制困境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竞争性压力,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改制转型,并大致于 1998 年完成。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是由少数“能人”创办发展起来的,政府或集体经济的主要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入许可”^②,以及少量资金。因此,浙江多半的制度主体,是在乡土社会环境中、直接在民间自

^① 卓勇良:《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与战略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8 第 6 期。

^② [美] 道格拉斯·诺思等:《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载《比较》第 30 期,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主创业中形成的。市场流通体系也主要是在民间自主交易活动中形成,当然一些基层政府在商品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分明显,在浙江,人格化产权关系,既不是以改革原有产权体系,也不是以外部“植入”为主,主要是本地人利用本地资源在本地创业而形成。这就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上海、江苏和广东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或创办“三资”及港澳台资企业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本质区别。

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时的主要特征,因此基于历史时序的分类,显然可以称之为古典式市场化路径。英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早期,主要是通过私人资本的累积,逐渐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有了一个商人阶级,他们便会开始把自己或紧或松地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新型的社会”^①。甚至所谓农民企业家,也能在早期的市场经济国家找到。英国早期的工厂主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自耕农转变而来的,18世纪,民间自发的技术创新推动了英国早期棉纺织厂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英国一大批自耕农的身份变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先是成为手工工场主,然后就直接成为大工厂主^②。浙江一大批农民企业家的成长,也可以说是重演了英国市场经济早期发展的生动情景。

17—19世纪,英国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相对比较发达,但工业仍相对落后,公共产品,法治水平、金融和资本市场等均相对薄弱,腐败现象也相对较为严重。19世纪英国奉行自由贸易,“不列颠几乎是除开酒精以外它所生产的一切物品的一个开放的市场”^③,英国出口商品占GDP比重由1820年3.1%上升到1870年的12.0%,差不多增加了整整3倍^④。而1851年的英国工业规模仍较小,工人总数大致为217.3万人,只占英国人口的15.4%^⑤。金融体系仍较简陋,到1853年,纸币

① [英]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2页。

② [法]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1页。

③ [英] 克拉克:《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④ [英]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⑤ [英] 克拉克:《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仍是主要的结算工具，支票要到 1855 年以后才普遍使用^①。十分明显，这些也是浙江在最近的 30 年内所具有或曾经具有的特征。

二 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的自然过程

浙江制度变迁的若干主要进程，主要是随着民间企业的发展，以及政府一些重大决策的推出和实施，从而在一种自然而然状态中持续推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间创业以及政府一些重大政策措施，最初的主观目的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经济主体和经济关系，而是客观上具有建构人格化产权关系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较好效果。

这种“功在诗外”式发展取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制度变迁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并在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形成、发育和提升。生产力发展冲破了原有制度安排的种种束缚，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全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于发展之中加快推进，自然而然地确立了全新的制度安排；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生产发展中快速提高，形成了改革发展的坚实的群众基础，并进一步加快制度变迁进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这么说，浙江的市场化更多的是“发展”出来而不是“改革”出来的。

民间自主创业的最初目的是解决温饱，政府最初容忍或促进民间创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就业等具体问题。浙江义乌的一位饰品业主何海美，1991 年时已积累了 50 多万元资产。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一家三口全靠丈夫每月 33 元工资，过年时买不起新布给两岁的儿子做棉衣，只能拉下窗帘布缝制，有着高中学历的何海美不得已在义乌县城街头做起了卖电影剧照的小生意，她在 1991 年时对笔者说，当时根本没想到做小生意发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对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政策主张，是 1979 年 8 月为了解决知青返城就业而提出的“允许个体经营”^②。对于发展农村个体经济，省委最早是在 1981 年 4 月，在加快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文件中提出来的，

^① [英] 克拉克：《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 1949—1993》，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发展多种经济，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当时显然还没有扶持市场主体和建立市场流通体系这样的意图。

民间经济的经营方式，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形成了快速提升的阶段性变迁。第一个阶段是拾遗补缺阶段，大致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是给城里的企业打工，以及利用边角废料和计划管不着的原料生产经营日用小商品。据1988年对浙江乡办机械工业企业等距抽样统计表明，生产零部件的企业约占全部企业的63%^①。第二个阶段是区际贸易阶段，主要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浙江个体私营及集体企业的低档日用工业品，大量销往“三北”地区，即西北、华北和东北，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即“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就是从那时开始流传的。另外从浙江出口贸易比重较低的状况中也可以间接观察到，1990年浙江出口贸易仅占全省GDP的11.6%。第三个阶段是国际贸易阶段，主要是90年代中期至今，浙江商品开始大批销往境外，出口贸易迅猛增长，1995年，出口贸易总额60.9亿美元，占浙江省GDP的18.1%；2007年达到1082.9亿美元，列全国第四位，占浙江省GDP的49.6%。浙江的外贸出口额已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

民间经济的组织形式，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形成了快速发育的阶段性变迁。第一阶段是个体经营户快速发展阶段，大致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5年。1985年，全省个体经营户达到63.7万户，1995年达到154万户，随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快速发展阶段，大致是1990年以来。2006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已达28715家，占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62.8%。第三阶段是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快速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同时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大量私营企业以戴“红帽子”或以种种形式依附于国有集体企业而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

^① 卓勇良：《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浙江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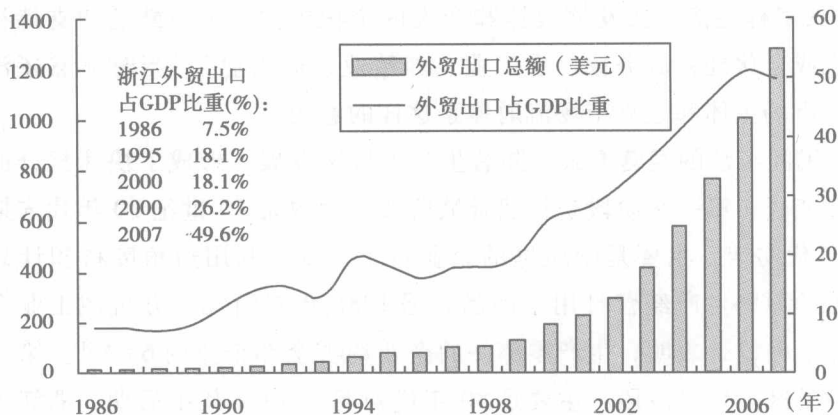


图 1986—2007 年浙江外贸出口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于政策上的重大转机，这些企业纷纷“摘帽”，恢复了其本来面貌。

这样，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数量不断增加，比重快速提高，企业规模迅猛扩张，整个社会的产权关系和要素配置方式较快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终于逐渐确立。至 2005 年，根据浙江省 2006 年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非公有制经济占 GDP 的 71.5%，公有制经济占 28.5%。截至 2007 年 12 月底，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 13.4%，集体工业仅占 0.8%，私营及境外投资企业则占 85% 以上。

三 形成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

纵观浙江制度变迁进程，是在坚持生产力发展为优先的前提下，不追求目标模式的最优选择，以最小化阶段性改革成本，最大化阶段性改革收益，通过阶段性体制模式的次优选择，形成了过程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

次优选择也是一种积极的改革策略。相对于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而言，现实社会存在着种种约束，因此只能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进行次优选择。这种次优选择一方面确实是创业者或改革者对于社会的一种妥协，但另一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固然畅快淋漓，但这在多数情况下往往行不通。因此，与其因为约束条件而难以以一

次性实现目标模式，还不如化大步为小步，稳步推进。

次优选择有利于最大化阶段性制度绩效。这种体制上的次优选择，适合整个经济社会的体制背景，适合生产力发展，适合干部群众的思想要求，适合社会情绪，因此能够在社会稳定局面下，达到最大限度地加快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浙江的制度变迁进程之路，就是在既有的经济社会体制框架下，在尽可能满足各种约束条件情况下，最大化阶段性目标值的一种次优选择。先是发展城镇集体工业，然后是发展农村集体工业，再后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改制城乡集体和国有工业，最终逐步建立起具有现代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企业。其中的一些阶段性制度变迁对于理想化目标而言，当然不是最优，但相对于约束条件而言，则收到了最大的经济绩效。

在历史性的长期累积中，形式上的次优转换成了实质上的最优，形成了过程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素效率极大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都有了相当的改善，经济社会高度稳定，整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收益，大大高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阶段性的次优选择照样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目标模式。

第二节 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

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对于民间创业者来说，还存在着较多体制机制障碍，因此也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创新体制机制模式。同时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具体细节尚不清晰，地方政府也需要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工作。

一 民间的最佳行为模式

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民间创业的一个总的行为特征，就是形成了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从早期的着力避免与政府的正面冲突，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积极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再到进入 21 世纪以后，着力提升自身的制度和产业层次，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最佳行为模式。特别是在早期和中期，即 7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具有如下三方面重要的行为特征。

——拾遗补缺。这既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一方面是资金和技术均很薄弱，另一方面是在“一大二公”的强烈偏好下，民间创业空间非常有限。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在计划经济缝隙和缺陷中艰难起步，如利用计划体制不管的原料发展生产，又如在政府管制比较薄弱的领域和区域发展经济等；其次是积极做好国有企业配角，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一些民间企业和个体户，积极替国有企业生产零配件，以及进行有关的服务；再次是以当地原料发展生产，如开发农产品加工，发展建材业等。笔者在1988年利用工业普查资料所做的城乡产业结构比较表明，尽管当时指责乡镇企业重复生产、以小挤大，但仍有较大的城乡工业结构差异^①。

——创造多种过渡性制度形式。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创业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直接冲破计划经济，既难以冲破，亦成本太高，结局是得不偿失。因此，当时的最佳选择，是在最小化道德和法律风险前提下，创造灵活多样的形式，以民间创业兼容计划经济，千方百计打入计划经济内部以求得创业成功。以现在的眼光看，乡镇集体企业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形式，既能满足政府的集体经济偏好，又给大量农村“能人”提供了施展创业才能的良好平台，同时也可以使各种风险最小化。此外还有股份合作制、各种形式的挂靠、温州著名的“挂户经营”等，而一些专业市场也可以理解为是过渡性的制度形式。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形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超越产权关系。这也可以理解是“先有产，后有权”。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民间创业者来说，既不可能形成个人所有的财产关系，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创业者们的行为特征就是不去理会财产权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浙江的民间创业者天生具有战略眼光。他们不拘泥于短期的财产权利关系，关键是用好这一难得的创业权利，因为他们如果拘泥于产权，就会生出种种疑虑和犹豫，就不会有他们今天的个人资产。这样，在事实上的个人财产基础上，继1988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修改“82宪法”，并又相继于1993年和1999年两次修

^① 见第四章第二节。

改，在宪政层面上肯定了个人产权关系，民间创业终于从边缘走向主流。

二 政府的最佳行为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顺应民间要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坚持实施若干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转型也取得了重大成效。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进行的评选，2005年，在参评的60个经济体中，即51个国家地区，9个国家所辖的内部经济体，浙江省的政府效率列第18位。浙江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利用2006年数据做的分析也表明，浙江的政府职能转变，在全国名列第一。在这30年中，以若干重大事件为标志，浙江的政府转型大致具有三个阶段性的行为特征。

——顺势而为。改革开放至1991年。针对群众要吃饭，全省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等严峻现实，对于群众和基层的创业行为，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容忍、默认、不争论、跟着群众走等做法。与此同时，切实按照中央整体部署，积极调整经济方针，改革计划、物价、外贸等体制，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一阶段，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快速壮大，个私经济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积极作为。1992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改革进程明显加快。重点推进了电力、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城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继提出城市化等重要发展思路，开始实施行政审批制度等政府改革措施。在这一阶段，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以及比较发育的市场流通体系基本确立，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行为进一步优化。

——科学有为。大致是2002年至今。在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指引下，统筹推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创业创新”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路，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

阶段性的次优导致整体的最优。历史地看，浙江的政府转型，措施似乎不是最有力，口号似乎也不是很鼓舞人心，甚至思想也不是最解放。但至今为止的转型过程表明，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比较容易得到

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能够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最小化体制摩擦,最大化制度变迁绩效,在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实际成效较好,形成了长期累积性的最优效应。

三 形成民间与政府的最优行为组合

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创业创新是最优的行为选择;对于政府而言,支持民间创业创新是最优的行为选择。这就形成了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一种组合,从而使得民间与政府之间形成纳什均衡,即一种最优的行为组合。

在浙江早期的制度变迁进程中,就微观经济行为来说,民间与政府在一种一对一或类似于一对一的谈判中,实现相互间的妥协。

民间创业者固然希望新的制度安排能形成较大的自主活动空间,实现利益最大化,但也以比较现实的态度进行制度选择,他们往往愿意在一个次优的利益点上与政府达成制度安排的妥协。因为民间创业者清醒地认识到,在体制约束情况下,最优体制只是一种理想,如果一味地追求这种最优体制,反而不会达到最佳利益状态。民间通过对于政府的妥协,赢得了创业创新快速推进的时间和空间。

政府早期在多数情况下,也并不会完全墨守传统体制的成规,但也绝不会不顾一切地支持民间创业者。因为任何一种极端的状况,都不会带来最佳利益。在各种利益权衡之下,其中主要是在增进区域利益的激励之下,政府实现了与民间创业者的妥协。然而这一妥协点绝不是维持原有体制或最大限度地支持民间创业者,而是在维持原有体制和支持民间创业之间、在利益最佳化基础上的一个均衡。

政府显然逐渐从民间创业者的经营业绩中,认识到其巨大的潜在价值,从而愿意在更大的公共利益基础上,主动实行更为灵活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都是以牺牲传统意识形态纯洁性,抛弃僵硬的国有集体经济正统论为代价的。渐渐地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在民间创业的良好绩效的支持下,支持和促进民间创业成为浙江各级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

十分明显,关于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妥协,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积极的互动。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积极的方面,认识到这种互相之间的让步,对于浙江制度变迁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即有利于在既定的体制机制框架下,达成民间企业发展与政府公共服务变迁的共赢。

第三节 多因素支持

在浙江民间创业进程中,存在着多个因素的强有力支撑。由此也构成了关于浙江制度变迁进程分析的一个基本理论架构,亦即“一条主线,两个主体,多因素支持”。

一 激励较强

浙江民间创业推动的制度变迁,是在摆脱贫穷的强烈激励下推进的,从“率先贫穷”走向了“率先改革”。1949—1980年,温州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4%,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人均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1.1%。考虑到1949年农业生产总值低于20世纪30年代,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温州在1980年时的实际人均农业产值甚至有可能低于20世纪30年代。1981年,温州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仅71.2元,比全国101.3元低30.1元,是中国最贫穷区域之一。全国1981年有6个省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收入低于80元,而温州8县除乐清为81.2元外,其余7县均低于80元,其中永嘉、文成和泰顺低于60元。

浙江的贫穷与其他地方世代代的贫穷不一样,是一种曾经富裕过的贫穷。因此,一方面是摆脱贫穷的愿望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是富裕时期形成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创业的激励。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浙江农民勤劳精明等优秀习俗,工商业传统铸就了浙江人的商业精神,一旦打开了加之于浙江人身上的体制束缚,历史形成的经济能量就奔腾而出。

一系列优越的环境条件支撑和促进了浙江民间创业。首先是位于沿海,交通方便;其次是毗邻上海,与上海“血肉相连”,创业学习等成本费用均较低;再次是人口稠密,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相统一,企业初创时期即能具有较强的规模效益。贫穷激励与环境优越相结合,推动浙江民间创业很快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